

围绕远征日本窥探到的高丽忠烈王的政治意图

金甫桃

导入语

1. 日本远征的进行过程
2. 高丽对日本远征的态度：对日本的招谕以及第一次征伐时期为止
3. 围绕第二次征伐窥探到的忠烈王的意图

结束语：代替结论

导入语

随着蒙古进入高丽，蒙古帝国的登场和扩张这一世界性事件对高丽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蒙古对高丽的影响大体上可以分为'抗蒙'为主调的战争时期和战争以后的'干涉期'，始于1219年止于14世纪中后期历经将近两百年的时间。先后策划过两次的'日本远征'属于干涉期。日本远征是蒙古给日本发了要求降服的招谕碰壁后，蒙古率高丽亲自伐日的事件。

过去的主调都认为'日本远征'是由蒙古牵头，动员高丽参与的战争。发言人并不想否定远征中高丽被动员的事实本身。发言人想强调的是，可以看出忠烈王的立场从第一次远征时的消极回避，转变成第二次远征时的积极参与。因此，本文中尝试整理一下态度变化中所隐含的忠烈王的意图和政治目的是什么。`

最近的研究方向已经脱离了高丽怎样被动地动员到伐日的视角，将更多关注点放在高丽怎样利用了该事件。其一、如李明美所主张，高丽王的目的是借助蒙古帝国的威势巩固王位，所以发生了态度变化。忠烈王兼任日本远征推进机构征东行省的丞相一职，由此巩固了国王的地位。其二、得到蒙古帝国驸马身份的高丽王，积极利用了忠烈王的立场所要履行的'助军的义务'。这两种观点虽

然多少有些出入，但是都认为忠烈王期待的是蒙古帝国的丞相和驸马等要素带来的政治效果。

此文的目的，在于进一步详细考察忠烈王的立场。

1. 日本远征的进行过程

刚开始高丽参与日本远征是为了给身负招谕任务的蒙古使臣带路。1266年(元宗7年)蒙古遣使黑的和弘恩赴日，并要求高丽给使臣带路。高丽派宋君斐和金贊等护送，但是走到巨济岛时由于风浪太大返回了。第二年蒙古委托高丽进行对日本的招谕，于是高丽派了潘阜携带蒙古和高丽的国书去了日本，但是日本未接受招谕无功而返。之后，前前后后有十几波的蒙古人和高丽人被派往了日本，但是都被扣押或杀害，蒙古对日本的外交招谕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

前后六次派遣的使臣都失败后，蒙古决定直接伐日。于是，又在高丽建造战船，又派使臣到黑山岛等高丽南端侦查地形。并且，以解决军粮的名义在高丽设了屯田。1271年(元宗12年)为了管理屯田，还设立了屯田经略司，并将蒙古军派驻到凤州、金州、盐州、黄州、白州、海州等十多处。高丽由于战争已经非常荒废，但是为了配合蒙古的要求不得不苦苦努力。

1274年6月，日本远征准备工作告一段落。经过几年的准备，东征都元帅府的忻都和洪茶丘的率领下，由25,000名蒙汉军组成的第一次日本远征军起航，高丽也由金方庆任都督使，派8,000名军士、6,700名船夫、900艘战船参战。第一次远征的初期，在博多一代的战斗中蒙军和高丽的联军打了胜仗，但是战争的最终结果却是相反的。此时，金方庆率领的高丽军在博多一代占上风形势非常有利，但是天黑以后忻都主张先撤退，金方庆主张乘胜再战一场。联军最终还是按照忻都的主张先撤退，众所周知，这次错误的决策导致了联军的失败。不管怎样，因为听了蒙古将帅的命令，第一次远征以失败告终，葬身大海回不来的人也多达13,500名，可以说损失惨重。这里需要关注的一点是，高丽和蒙古指挥将帅对战势的判断和措施上发生的分歧。

第一次日本远征遇到台风还没怎么打就败了，不甘心的忽必烈再次向日本派去宣谕使，同时继续准备战争。直到1279年(忠烈王5年)完全征服南宋，也有了一定的余力后，加快了日本远征的步

伐。此时，为了打退开始侵略南方沿边的倭寇，也为了加强在蒙古帝国内部的地位，高丽也积极参与了。忠烈王被任命为日本远征的推进机构-征东行中书省的丞相(1280)，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驻扎在高丽的忻都、洪茶丘等蒙古将帅的横行霸道。

但是，高丽不得不再次承担沉重的负担。为了准备远征所需的10,000名军士、15,000名船夫、900艘战船、11万担军粮以及大量的武器，高丽调用了国家的所有生产力。第二次日本远征时，位于高丽的征东行省麾下的高丽军、蒙汉军以及位于中国江南地方的伐日行省麾下的江南军都联合起来攻打日本，但是又遇到台风损失了10多万人无功而返。

2. 高丽对日本远征的态度：日本招谕以及第一次征伐期为止

发言人在这里要关注的部分是高丽的态度。首先，看一下需要劝降日本时的初期情况。

1) [(丁卯)八年 春正月 宋君斐·金贊與蒙使, 至巨濟松邊浦, 畏風濤之險, 遂還. 王又令君斐, 隨黑的如蒙古, 奏曰, “詔旨所諭, 道達使臣, 通好日本事, 謹遣陪臣宋君斐等, 伴使臣以往. 至巨濟縣, 遙望對馬島, 見大洋萬里, 風濤蹴天, 意謂 ‘危險若此, 安可奉上國使臣, 冒險輕進? 雖至對馬島, 彼俗頑獷, 無禮義, 設有不軌, 將如之何?’ 是以, 與俱而還. 且日本素與小邦, 未嘗通好, 但對馬島人, 時因貿易, 往來金州耳. 小邦自陛下即祚以來, 深蒙仁恤, 三十年兵革之餘, 稍得蘇息, 綿綿存喘. 聖恩天大, 誓欲報効. 如有可爲之勢, 不盡心力, 有如天日.”](高丽史卷26 世家26, 元宗8年(1267) 正月)

2) [癸丑 蒙古遣黑的·殷弘等來, 詔曰, “今爾國人趙彝來告, ‘日本與爾國爲近隣, 典章政治, 有足嘉者. 漢唐而下, 亦或通使中國.’ 故今遣黑的等, 往日本, 欲與通和, 卿其道達去使, 以徹彼疆, 開悟東方, 向風慕義. 茲事之責, 卿宜任之, 勿以風濤險阻爲辭, 勿以未嘗通好爲解. 恐彼不順命, 有阻去使爲托. 卿之忠誠, 於斯可見, 卿其勉之.”](高丽史 卷26 世家26, 元宗7年(1266) 11月 癸丑(25))

以上的案例中看出，高丽觉得外交上招谕日本这事相当棘手，想尽办法抽身。如果，日本答应外交上的招谕降服蒙古还好说，否则，为了让日本降服蒙古会不惜发动战争，显然高丽会直接或间接被卷入战争是避不开的。况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猜到日本不会同意降服。这点可以在1268年高丽送往日本的国书“奇装异服的人们突然跟我们一起过海，贵国禁不住会怀疑我们的意图。〈中略〉无法抗拒忽必烈的命令，只得将蒙古的使臣带到了海边，但是以风大浪高为由拖延时间后，最终返回了。这表示我国对贵国的态度。”(镰仓遗文 no.9845 高丽国牒状)中也能窥探。

接下来准备第一次征伐的过程中，高丽曾多次向蒙古反映战争筹备物资已经是无法承受之重。

3. 二次征伐中忠烈王的意图

第二次征伐过程中情况出现了变化。之前都是蒙古要求高丽对日本进行招谕，现在是高丽反过来先提出要伐日。看下面：

3) [王又奏曰，“日本一島夷耳，恃險不庭，敢抗王師，臣自念，無以報德，願更造船積穀，聲罪致討，蔑不濟矣。” 帝曰，“王歸與宰相熟計，遣人奏之。”] (<高麗史> 卷28, 忠烈王 4年(1278) 7月 甲申(3))

在这里忠烈王在建议忽必烈由高丽先伐日，事实上是忠烈王劝谏忽必烈伐日。当然，上述的对话发生在解决高丽-蒙古之间迫在眉睫的金方庆诬告事件的过程中，有可能高丽不得不表态积极支持蒙古的伐日。不管怎样，这些措辞的前提是高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承担伐日所需的负担，跟第一次征伐时想尽办法逃避负担的态度是有很大差异的。

那么，让我们来探讨一下围绕着两次伐日高丽的态度发生变化的背景是什么。关于忠烈王对二次征伐表现出积极性的理由，大致上理解为改善高丽与蒙古的关系，进一步牵制洪茶丘等在高丽的蒙古势力而不得已的作为。当然，不能否定这点，从宏观的角度也不认为这样的解释是错误的。不

过，这可以说明当时高丽的政治背景，如果说是发生态度变化的直接理由稍显欠缺。

相信一个国王在做决策时，不仅考虑高丽-蒙古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还会考虑其他方面。因此，准备两次征伐的主体-两位高丽国王的差异是导致态度变化的直接原因。元宗和忠烈王是父子关系，经过一个世纪的武臣弄权王权被削弱的情况下，两位国王都想回复王权。但是，理解和接纳蒙古的程度上有一些差异。下面的插曲很能说明问题。

4) [幸西北面，迎公主。順安公惊廣平公諱帶方公澈漢陽侯儂平章事俞干遇知樞密院事張鎰知奏事李汾禧承宣崔文本朴恒上將軍朴成大知御史臺事李汾成從行。(a)王責汾禧等不開剃，對曰，“臣等非惡開剃，唯俟衆例耳。”蒙古俗，剃頂至額，方其形，留髮其中，謂之怯仇兒。王入朝時已開剃，而國人則未也，故責之。後，宋松禮鄭子璵開剃而朝，餘皆效之。初，印公秀勸元宗，效元俗，改服色，(b)元宗曰，“吾未忍遽變祖宗之法。我死之後，卿等自爲之。”] (高麗史節要 卷19 忠烈王 卽位年(1274) 10月)

以上是1274年忠烈王迎接入境高丽的齐国大长公主时，根据蒙古习俗改变发型相关发生的轶事。(a)和(b)中可以看出元宗和忠烈王对改变发型的不同态度。如(b)所示，元宗表示自己无法将发型和服饰改成蒙古式，要求臣僚们要改自己死后再改。相反，如(a)所示忠烈王先于别人改变了发型，还责备尚未改变发型的李汾禧。这可以理解为忠烈王比他的父亲元宗更努力积极接纳蒙古的影响力。

并且，建议和筹备第二次征伐的过程中，有必要仔细分析忠烈王的建议。忠烈王在准备征伐的过程中，提了七条建议。

5) [王以七事請，“一，以我軍鎮戍耽羅者，補東征之師，二，減麗漢軍，使闍里帖木兒，益發蒙軍以進，三，勿加洪茶丘職任，待其成功賞之，且令闍里帖木兒，與臣管征東省事，四，小國軍官，皆賜牌面，五，漢地濱海之人，并充梢工水手，六，遣按察使，廉問百姓疾苦，七，臣躬至合浦，閱送軍馬。”帝曰，“已領所奏。”] (高麗史 卷29 世家 29, 忠烈王 6年(1280) 8月乙未(2

3))

6) [小國軍民, 曾於珍島·耽羅·日本三處, 累有戰功, 未蒙官賞, 伏望追錄前功, 各賜牌面, 以勸來効. 每一千軍, 摠管千戶各一, 摠把各二, 花名, 抄連在前. 請以上將軍朴之亮, 大將軍文壽·羅裕·韓希愈·趙圭·親從將軍鄭守琪·大將軍李仲·朴保·盧挺儒·安社等十人爲摠管. 大將軍趙抃, 將軍安迪材·許洪材·金德至·徐靖·任愷·金臣正·李廷翼·朴益桓等十人爲千戶, 中郎將柳甫·金天祿·李臣伯·辛奕·崔公節·呂文就·安興·李淳·金福大·車公胤·李唐公, 郎將朴成進·高世和, 中郎將宋仁允, 郎將玉環·桂富·金天固·李貞·徐光純·咸益深等二十人爲摠把.] (高麗史 卷29 世家29, 忠烈王6年(1280)11月 己酉(11))

以上的两条记录中可看出, 忠烈王请求给高丽的将帅授予蒙古的官职, 也举荐了候选人。忠烈王提出了将高丽军将帅任命为万户、赐予牌面等要求。这意味着蒙古官职的授予是在高丽王的要求下发生的, 反映着强烈的忠烈王的意图。

那么忠烈王的意图又是什么呢? 首先, 他提议限制洪茶丘的晋升, 等立功了再赏, 由此看出要牵制洪茶丘的意图。同时, 表面上是授予与蒙古相同的官衔构建统一的指挥体系, 事实上是从蒙古军分离出高丽军避免指挥上的混乱, 更深的意图是本人亲自掌管高丽军指挥府的人事权。

忽必烈悉数采纳了忠烈王的这些建议, 给高丽赐予了虎符等。由此, 忠烈王可以给金方庆等高丽的将帅授予蒙古的官名和印章。

7) [帝冊王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左丞相行中書省事, 賜印信. 又以金方慶爲中奉大夫管領高麗軍都元帥, 知密直司事朴球·金周鼎爲召勇大將軍左右副都統, 並賜虎頭金牌·印信. 趙仁規爲宣武將軍王京斷事官兼脫脫禾孫, 賜金牌·印信, 朴之亮等十人爲武德將軍管軍千戶, 賜金牌及印, 趙抃等十人爲召信校尉管軍摠把, 賜銀牌及印, 金仲成等二十人爲忠顯校尉管軍摠把.] (高麗史 卷29 世家 29, 忠烈王 6年(1280) 12月 辛卯(23))

1281年3月壬子，金方慶、朴球、金周鼎等率军赶到合浦，可见此时任命蒙古官职是伐日所需的编制过程的产物。就是说，忠烈王要求蒙古军官职位上任命高丽的将帅并获批，这样担任蒙古官职的高丽将帅们参与了第二次伐日。由此可猜测到，忠烈王向蒙古要求官职的意图是建立与蒙古军相同的指挥体系，并行使自己的影响力。

这些现象可以理解为，打造忠烈王‘下赐’万户等蒙古官职或金牌等的‘架势’，掌握和巩固了军队的统帅权。忠烈王通过行使蒙古官职上的人事权，不仅掌握了统帅权，甚至还获取了他们的忠诚。万户等职位的任免或剥夺等人事权，有效提高了国王对臣僚的掌控力。

还需要考虑的是征东行省的存在。征东行省是蒙古以伐日为目的设立的军司令部性质的军前行省，这点是很早以前达成的共识。1280年策划第二次征伐的过程中设立的征东行省，这次设在了高丽，忠烈王被任命为征东行省的丞相。接下来的1280年6月左右，蒙古开始商议伐日的事宜，并于同年10月将忠烈王任命为征东行省的左丞相，12月份又任命为右丞相。日本远征结束后的1283年6月，忠烈王再次被任命为征东中书省的左丞相，与阿塔海共同处理征东行省的事务。此时，忠烈王在征东行省内已经处于最高的位置。

对于只担任高丽官职的大多数臣僚而言，忠烈王是毫无疑问的唯一命令权人，也是一国之主。但是，行省官等编入蒙古官僚体系的高丽出身的臣僚来讲，高丽王不是‘唯一’的君主。事实上，蒙古皇帝的威望和影响力更大。因此，高丽王迫切需要在蒙古官僚体系内确保高位官职，进一步能对行省的人事权发挥影响力的丞相的地位。通过这一系列的操作，最终决策权人形式上是蒙古皇帝，但是在万户、总管等职位在内的蒙古官职的任命上，形成了由高丽王推荐的高丽官僚担任的局面。于是，高丽王可以与蒙古官职上的高丽人维持君臣关系，这也是忠烈王积极推动二次伐日的政治目的所在。

结束语：代替结论

忠烈王既是蒙古皇帝的驸马，又是征东行省的丞相，有着高丽国王、驸马、丞相等身份。忠烈王凭借这些身份可以在高丽国内，与蒙古官僚之间的关系中确保自己的威望。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说忠烈王积极利用了蒙古的伐日，尤其是二次伐日。

可以说，忠烈王的意图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效。但是，乃颜的叛乱中打到平壤，并向忽必烈表示有意助军，这是他为了维持自己作为蒙古王室成员的威望而不得不采取的行动。换句话说，依附蒙古确立和加强王权威望而做出的忠烈王的选择，最终限定了高丽在政治和外交上的斡旋余地。

（翻訳：李金花）